

小张买画

唐吉慧

小张小我十岁，云南人，生得眉目清扬，很有点灵气。上海一家大学旅游专业的毕业生，我原以为他是个导游，他却落脚在市内一家五星级酒店，入职时是餐饮部的服务员，小伙子做事用心，没两年升领班了。我认识他是在一场拍卖会上，我的拍卖行朋友老顾介绍说小伙子是这家酒店餐饮部的工作人员，对艺术感兴趣，现在正学鉴定。他客气地跟我握握手，正巧吃饭的时间，便大方请我和老顾吃了顿海鲜自助餐。

这些年拍卖火热，各大拍卖行常常借了酒店的会场办拍卖会，小张所在的酒店一年就有好几场。他不懂这些，起初当班闲暇时偶尔偷偷去凑热闹，他见到了许多在书本和电视里看到的名字，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他辨不了真伪，更买不起。他见到这些名字心里无比激动，虽然博物馆也陈列着，但都不会像预展时那样近得可以趁保安不注意摸一摸边缘，甚至对着画心呼一口气，他呼出的那一口气，让他觉得他会随着这张画一同传世。

后来我知道，老顾说小张在学鉴定，其实是在教小张做字画的买卖。老顾是在小张酒店吃饭吃多了和他熟悉的。小张没少请老顾吃饭，嘴上不离顾老师的好，一次小伙子跟他讨教拍卖诀窍，老顾觉得他诚恳、谦虚，耳一热，就答应教他一两手赚点小钱，不过请他先接着给他开的书单一把书买来，好好用功读一读。果然之后师傅带着小徒弟跑各地的拍卖会了，参加一些画商间吃饭喝酒的应酬，手把手，教他需要熟悉的艺术家各自作品的风格特征，常见的作伪手段，理论加上实践总是真理，小张在老顾的锻炼下快成了老张。老顾挺高兴，说带着这个小徒弟运气碰得不错，一来二去，两三年下来赚了不少。我跟小张认识的时候，小张已经美滋滋酝酿着要辞了领班的工作，下海了。

小张是帮过我的忙的，他晓得我喜欢名人书札，去年从北京特地给我带回来一件狄平子的信札。当然他讲明是拍卖买的，我自然加价从他手里匀来，这是应该的。狄平子是狄葆贤，康圣人的学生，民国时著名的出版家，创办了《时报》、有正书局。十多年前我在一位前辈家中见过一页狄平子的扇面，录了一段北碑文字，暗暗惊讶出版家的楷书竟然如此雄浑且不失儒雅，到底不是一般人。这封信的内容很励志，狄平子对他的次子汝为说：“……凡人一生进退得失，无往非命。孰主张是，命也。然亦由平日简练揣摩发愤用功所致也。先汝母太息说：凡人闲居时，亲友愿为介绍，皆空言尔，何如专心考试，能操必

民以食为天。同济大学的“吃”算得沪上高校一绝，“吃在同济”似乎已成为同济的标签，同济人也乐得接受。但很少有人知道，同济的“吃”可是有历史的，更与国家对大学生的关心、培养密不可分。笔者近来走访老校友，听到了一些老同济在“吃”上的事故。

1953年，徐吉沅从杭州高级中学毕业后考入同济。这一年，也是新中国初步完成院系调整实行全国统考的第一个月。就在徐吉沅步入同济大门前的几个月，毛泽东同志提出学生要“三好”，其中就包括“身体好”。为此，全国各地各级学校除了鼓励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外，还在“吃”上动脑筋。徐吉沅回忆：我刚进校门就知道学校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每日三餐的饭和菜。所有同学都住在学校宿舍里，也不必付住宿费，我母亲只要给我一点零花钱就行了。所以母亲说“真的是国家在培养人才呀”，“你运气真好，我小时候因为家里孩子多就读不起书，初中就辍学了。”

如今已七老八十的同济老校友都认为当年同济的伙食的确办得不错，他们还都还记得食堂里有道菜：底菜是鸡毛菜，上面有一块大肉或者鱼之类的，很受欢迎。他们都认为，伙食好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党的政策好，另一方面就是学校动脑脑筋，食堂师傅的烹饪水平也较高。实际上，当年同济食堂还实行“帮厨制”，组织各系各班学生轮流去帮厨。这些学生一般在上课前和开饭前半小时去食堂劳动，帮助拣菜洗菜，做好开饭的准备工作。这个做法也很受学生的欢迎。当然同济食堂还有一个绝招，就是每个星期总有一天的菜特别“实惠”，青菜是青菜、肉丝是肉丝的，荤菜比平日要多一些，同学们称之为“打牙祭”。这一天上海很多高校学生通过“中学同学”、“老乡”等途径被吸

得。我云：自力更生，为寒门出路，我一生全靠考试……”最后一句话最富趣味：“还望自加谨慎，节养休息。常吸香烟，少周旋。”叫小孩子听话，不相干的事情少搭理是人之常情，做老子的叫仍在学堂上念书的儿子“常吸香烟”，倒是第一次听说。

那天小张约了来我这里坐坐，我见他垂头丧气，问他怎么了，他说出了件大事，今天特地来跟我告别，想回家里冷冷静静。原来他自认为这几年跟着老顾生意懂得多了，尝了甜头，这回没告诉顾，自作聪明把这些年积下的全部家当压在了一幅刘海粟的山水画上。“那时没沉住气，热昏头了。”他沮丧地说。他找到买家打算出手，对方细致，请了专家再三鉴定，结果是一幅木版水印。由于年代久远，画上的点点黄斑迷惑了小张的眼睛，如果不是拆了镜框，发现画芯背面少了笔墨的印迹，它简直和真迹一模一样。小张这才着急找来师傅相救，老顾骂了他一顿，也没帮上他的忙。我多少同情他，这大意的荆州，全赔了，学费太高了。老张终究只是小张。

书画作假自古有之，一点不稀奇，当年张大千做了石涛的假画卖给罗振玉，还存心当众说穿，出了一代大师的丑，这对罗简直是奇耻大辱。我也上过当，十多年前在城隍庙，初出茅庐的文艺小青年，文心烂漫，学人家搞收藏，在地摊一个人使劲琢磨，兴奋地以2000元买了张名人书法，以为捡了大便宜，在好友面前一显摆才发现了问题。友人为我一一解读出玄机，立断——赝品无疑！这使我大为懊丧，他倒卖起关子，让我将这假字暂存他处，过些日子保我开心。过了两个月，友人给我电话，叫我去拍卖行取钱，原来他将赝品送去他熟悉的拍卖行拍卖了，除去本钱，我足足赚了300块。他笑着对我说字画这行当，有一半的人比你聪明，就有一半的人比你笨。我当时觉得庆幸，现在想想有点后悔——这赝品我是误了他人了。经了教训，我不再乱买艺术品，更明白了这句收藏圈的时兴话：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没有随随便便的捡漏。

小张回了云南，有时给我个消息说在看书书，有时候又说去看雪山了，有一搭没一搭的。还说把事情告诉了父母，父母没怨他，希望他这次回去能留下来找份工作陪伴他们。最近突然来消息说回上海了，凭着以往的经验，找了饭店的工作，做回老本行，“字画是艺术品，用来养心的，我虚火太旺，不敢才怪！今后会踏踏实实工作。”

“字画是艺术品，用来养心的。”小张悟道了。

画室内的写生（油画）冷军



“吃在同济”的由来

章华明

引到了同济，同济食堂往往供不应求，“吃在同济”的名头也就不胫而走。

当年同济园里除了大学生外，还有工农预科学生，其实也就是中学生，后来改制为同济附中。1964年与李生兄弟一起考入同济附中的曹子生回忆：我记得食堂里有一个叫“阿陶”的师傅，貌似方脸，具体模样有点模糊了，但是人绝对是热情的，饭菜可口。那时，食堂里有两样东西，至今印象深刻，一个是里面放有油炸小带鱼块的冬瓜汤或三鲜汤之类，将带鱼油炸后煮汤，我以前在家里从来没有吃过。另一个是烂糊面，很受大家的欢迎，当时有如今称为“舌王”的好食者，一下可以吃八两（10两制，不是16两制），因而得了个“八两烂糊面”的雅号。

当年的“红人”，曾担任同济大学学生工团团长的叶祖俊是在1956年考入同济的。想起过去，他是一脸的满满的幸福：我进学校时，伙食很好。当时每月伙食费标准是12.5元。我们当年就餐在新盖的第二食堂，八个人一桌，菜很丰盛，饭敞开着吃，中秋节还发月饼。1958年“大跃进”时，食堂还准备有夜宵，“挑灯夜战”后可凭票去吃。吕光达

是1959年走进同济园的。他回忆，有一段时间在食堂吃饭不用饭菜票，饭也是不定量的，就装在大饭桶里，里面放有好几个饭勺，同学们随便盛。但戴眼镜的同学可苦了：遇到很多同学都围着一个饭桶“抢”饭勺时，热饭的蒸汽上来，眼镜片上一片雾气，根本看不见饭勺。无奈，这些同学只能弄一个尽量大的饭碗，一次搞定。

上海交通大学向隆万教授回忆：我是1958年考入同济工民建专业的，后改读数学专业，1960年起被送到复旦数学系代培，最后拿的是复旦的毕业证书。当时，我经常复旦、同济两边跑。复旦文科讲座特别多，三教九流，饶有趣味；同济伙食好，实在很吸引人。这其中除了同济食堂饭菜的确做得比较可口以外，还应该与两校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当时复旦属宝山县，只能享受郊区待遇，而同济属杨浦区，享受市区待遇，待遇比复旦好，当时已有同学说“玩在复旦，吃在同济”了。向隆万的回忆在刘桐林这里得到了印证。刘桐林是1961年考入同济的，他说的确，复旦、同济这两所大学虽为邻居，但供应标准不一样：每人每月的食油定量同济也复旦多一两。复旦学生更羡慕的是同济学生每月有一斤的“就餐券”，这等于增加了一斤的粮食定量。“就餐券”半两一张，很好用，更实惠，上午课间吃一块点心或一根油条、一个大饼，同学们都很满足。这就使得几条马路之隔的复旦学

生很是羡慕。

那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助学金，农村来的同学基本都有助学金。城里同学如小业主、小职员等家庭出身的，家庭收入不多，也有数额不等的助学金。助学金每年评一次，先是分甲、乙、丙三等，分别为15.5元、12.5元、9元三等，后来分14元、9元、6元、3元四等，特困生还可以补助3元零用钱。

1960年底，面对经济困难对大学生健康带来的困扰，同济党委根据“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问题的决定”，成立了“生活工作领导小组”，采取办好食堂、减少开会、控制社会活动时间、保证睡眠、严格执行作息制度等措施，大抓生活，努力保证学生、教师的身体健康。这个时候已经有粮票了，实行分食制，学生需要买饭菜票就餐。食堂的菜分甲0.15元（有鸡蛋、鱼、肉）、乙0.10元（有荤素）、丙0.05元（基本是全素）三等任同学选购。叶祖俊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成了学生的大问题。学校就动脑筋，尽量让学生能吃饱肚子。食堂也想了很多办法，如搞“双蒸饭”，即把蒸好的饭再蒸一次，使出饭率从1.6提高到3。“双蒸饭”能暂时撑饱肚子，但也饿得快。1960年到崇明参加围垦，劳动强度大，学校除给定粮补贴外，还给出了一些

陈学勇

是年二十七岁，林为美国本萨文尼亚大学建筑学学士，耶鲁大学戏剧科毕业。梁为美国本萨文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引自《年谱》最后版的《徐志摩：年谱与评述》，凡引文均出于此版。）

事实上，林、梁结婚是在一九二八年；该年林徽因二十四岁；她也不是建筑学学士，那时该校建筑专业不收女生，林徽因无奈注册到美术专业，仅旁听了建筑学课程。由于她的热爱、聪慧，三四年努力，竟成了建筑系的辅导教师，然而没有获取建筑学院的学位。

一九二二年三月记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婚，《年谱》有如下按语：

从周再举，是年林徽音在美，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他对于徽音倾倒之极，即此可见，而宗孟曾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非初衷也。（详见拙作《徐志摩与双栖老人》）

这一段文字为多种徐志摩、林徽因传记引述，读者中流布极广，学者也正是根据它认定林徽因曾与徐志摩相恋。对照陈从周写于年谱出版之际的《徐志摩与双栖老人》，文章对二十年代“论婚嫁”一说未见进一步具体说明，“小误会”究竟是什么误会，更不着一字。倒是又引出一段令人将信将疑的三十年代林与徐再恋的传闻：

民国十九年秋，徽音病肺居长春，志摩探视之，执手呜咽，徽音出自作小说一部，言其中主角即伊等二人，复重申婚嫁之议，事前徽音曾有一照一诗寄志摩，志摩黯然者移时，迟迟未成行，徽音再以电催之，始行。其时徽音病甚重，于是遵徐嘱迁北京西山疗养，适胡适之任北大教务长，遂辞光华教职单身往北京。次年冬以飞机罹难。年三十有六，此小曼告我者。

怎么冒出一个长春来？想必是梁林夫妇任教的东北大学校址沈阳的误记。我编撰林徽因年表，也据此将徐志摩去沈阳探视林徽因误系为一九三〇年秋，后查考其他资料，明白探视时间当在一九三一年元月。这段文字颇有“演义”色彩，所言林徽因的小说，大概指发表于《新月》杂志的《窘》。如果说这篇小说男女主人公原型是徐、林，那么恰好反证了林徽因无意“重申婚嫁之议”。小说女主人公已有两情相悦的同进同出男朋友，年龄、身份皆相当。全篇着意表现的“窘”态，恰是男主人公自作多情、一厢情愿的描绘。在没有其他材料佐证的情况下，《年谱》里“执手呜咽”情景，虽令人动容却难以置信。林徽因查出肺疾时间也不在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二月下旬，林徽因在北平陪友人往协和就诊，意外发现自己患上肺结核，且医嘱必须立即与家人隔离，梁思成已经考虑借居香山疗养。徐志摩赴沈阳探视林徽因时林尚不知此恶疾，如何能未卜先知？确诊时徐志摩正在上海，又如何遵他所嘱往西山呢？这末句“此小曼告我者”恰道出了以讹传讹。陆小曼既非亲历，又属事隔十余年的回忆，其可信程度可想而知——知情者除陆小曼，谁都没有这么说过。

《徐志摩与双栖老人》相同内容还系入《年谱》一九三〇年：

秋后辞南京中大课，应胡适之的邀请到北京任北大的教务……其间曾到沈阳探林徽音的病，因为这时梁思成在东北大学任建筑系主任教授，后来林遵志摩的意思，回到北京养病，于是志摩就住在她家中。

“住在她家”给好事的读者留下了排色想象，实乃子虚乌有。其时梁思成还没有辞离东北大学，按国人常情徐去借住有悖体统。徐志摩本来已经另有住处，明确记录在他写给胡适、陆小曼的信里。一九三一年二月初徐志摩告知胡适，“决意遵命北

上”，还说，“到北京恐怕得深扰胡太太。我想你家比较宽舒，外加书香得可爱，就给我楼上哪一间吧。”人到北平当日，在车站即由胡适子接往米粮胡同下榻。一切准备俱全，包括被窝，连徐志摩破了的丝绵袍子，胡太太都给他缝补好了。他很满意，报告陆小曼，“舒适得很”。徐有何必要再去寄居林徽因家？况且，此时林徽因从沈阳回北平，尚无自己的住宅，一时自身寄篱梁思成姐夫的东直门周寓，即使徐志摩有寄居林处的意思，绝对难遂他心愿。而徐志摩绝对不存此心，唯恐上海的陆小曼嫉妒、误会，他去西山探视林徽因，往往携朋友同行，是哪些人同行，一一信告上海太太。林徽因堂弟林宣说，偶尔单独前往，则是林宣随行。

林徽因没有热烈回应徐志摩的狂热追求，但仍然保持与他非同一般的友谊，尤其是，徐志摩死后她表露的深深悲伤，写了两篇动人的悼念美文，读者由此很乐意相信才子佳人有过缠绵故事。林徽因是否曾经恋过徐志摩，学界持论相左，至今尚无定论。不过，肯定恋过的一方，至少不能再以《年谱》为出发点以证其实，最好寻求其他有力证据。

喝咖啡

任溶溶

我曾经是个咖啡迷。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时，一早就到南京路铜仁路口CPC咖啡馆喝咖啡，喝完了再上班，在那里天天遇到艾明之同志。这咖啡馆当时兼生产咖啡。后来国家投资咖啡业，在延安西路的铁路附近开厂，CPC咖啡馆生产咖啡的任务就没有了，一位广东技师也到那边去了。CPC咖啡馆就成了只是家咖啡馆。

早上喝了咖啡还不够，傍晚我到南京路中央商场美新咖啡馆喝咖啡，和晚报的朋友聊天。

“文革”开始，CPC咖啡馆成了“裴多菲俱乐部”，给关了，改卖面条馄饨。我就改到八仙桥黄金大戏院旁边那个集中了好多个饮食摊的饮食店喝咖啡，咖啡煮得不错，记得好像是八毛钱一杯。我天没亮就去，一边学日文一边喝咖啡，直到朋友来了才放下课本聊天。

改革开放后，原来CPC地方的咖啡馆又开了，是为上海咖啡馆。我依旧天天去喝咖啡，并在那里会友。我的合作伙伴画家乐小英就到这里来和我讨论工作，我编故事他画画，登在新民晚报上。我认识乐小英同志是因为“文革”时晚报撤销，他到人民出版社编译室工作，我们同事。我们在晚报登了不少图文，但至今没有收集出书，十分可惜。

当时我不管出国，还是去香港、深圳，回来时总带上几大瓶速溶咖啡。

奇怪的是，我现在一口咖啡也不喝。这也是前几年生了一场病以后的事。这么一个咖啡迷，一下子竟断了喝咖啡的瘾。

我如今不喝咖啡，不过写到这里，对咖啡又有点留恋了。以后还会喝咖啡吗？走着瞧吧。

笔会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